

作者近照

1938年出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

1955年至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

长期从事文学报刊编辑工作 先后在《文艺报》、《河北文艺》、《人民文学》供职，1984年至1998年任《文艺报》副主编 现为文艺报社顾问、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五届、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兼任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冰心研究会副会长，《儿童文学》、《中国人物年鉴》、《出版史料》编委，《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顾问等。已出版评论散文集《梦里沧桑》、《我亲历的巴金往事》等10余部 其中《艺文轶话》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另编著《阿英文集》、朱光潜《艺文杂谈》等多部。

## 留下春光付秋时（代序）

冯骥才

文坛的风景一如车窗上的风光，一阵阵地掠过。我们从哪里还能看到昔日的景象？有时回首眺望，不免怅然于一片虚无。然而，我的好友吴泰昌却笑嘻嘻捧来一本厚厚的图书。里边有图有文有照片。待仔细一瞧，不禁一惊。许许多多文坛的往事，去世的先贤，过往不复的场面，还有我们风华正茂年代的音容笑貌，竟然都给他真真切切的保留在这部图书中了。

照片中的记忆总是大于照片本身。一帧照片往往带来时光倒流的神奇。它会复活一个事件，唤醒许多细节，散发出那年那月独有的气息。我们这些“当事人”一定会惊讶，泰昌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文坛照片的？是他“偷拍”到的吗？

我知道泰昌的秘密。二十多年来，他随身总是带着两样东西。一是小笔记本，一是一架口袋型的自动相机。在种种文友之间相互拜访与聚会中，种种文坛盛事或笔会里，他会随手举起相机“咔嚓”一下，或者掏出小本子把一些谈话及细节飞速地记录下来。这情景可能很多人见过，并不留意。但有心人却只有泰昌本人。

我想，泰昌的这种“工作方式”可能来自他在大学做研究生时收集材料的习惯，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对这些“文坛资料”的兴趣。他很看重这些资料的史料价值。这里边有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观——泰昌是站在明天的角度来观察今天，选择今天，记录今天和收藏今天的。当“今天”渐渐成为历史时，这些资料珍贵的历史性便一点点显现出来。

其实，我们也常常和泰昌同在一处。但把那些“现场”记录下来的却只有泰昌。这除去他独特眼光，再有便是他对文坛的钟情。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泰昌对文坛有浓烈的热情。他与文友们真诚交往，尊敬先辈，亲切后生。为人又急公好义，替人出力，排难解

纷，不辞辛苦。从他个人的视角看 文坛是情感化的。他把文坛看做花坛。所以，他才会这样珍视文坛的点点滴滴。现在，从这些难忘的瞬间里不是依然可以看到泰昌对文坛那一片赤诚么？

许多年里 泰昌供职于《文艺报》。由于他的敬业心强 整日奔波于各个城市和各种会议之间，因之亦得便于广泛地采撷文坛生活。泰昌所收集的文坛资料少人可比。大大小小写满了文字的记录本至少可以装满一箱，他自己拍的和他保存的他人拍摄的照片更是难以计数。这一切，全是第一手的，无可重复，都是泰昌身临其境的记录与发现。

现在，当泰昌动手把这一大宗资料整理与出版，其意义则是一个文学时代的侧影与旁证。它庞博、丰富、确凿。史料的含金量很高。而它的本身就是一部大型的插图本的当代文坛的纪实作品。看过这部书我们会感到，倘若没有这些照片和笔记，我们的文学便会有块遗憾的空白，永不能补。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泰昌这部书侧重于前辈同辈，兼及他的晚辈。任何时代的文坛都是三代人共存共创的文学空间。故而，这部图书所显示的是整整一个文学时代——即新时期文坛的面貌。

感谢当代文坛的有心人吴泰昌。他用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及其独有的眼光，留驻了一个时代。使我们身在秋日，坐享春光。

2001 年秋



## 导师杨晦



晚年的杨晦（图片杨锄提供）

我的老师很多 不是时下习惯泛称的老师。我当学生的年头之长应该说在我同龄人中是稀有的。如果不从童年在抗战江西保育院算起 有十八九个春秋了 虽然我的记性还好 毕竟不同时段使我受过益的老师屈指难数 不可能每个都留存下

清晰的记忆。2000年3月的最后一天 北大中文系庆祝建系九十周年 我回到母校参加庆祝活动 见到了一批四十多年前的同窗 虽然同在京城 多半是数年不见 在这个场合相聚 感触丛生。燕园风光依旧 当年给我们上课的老师 大多先后辞世，连健在的林庚教授也因病未能亲临。岁月无情！我想起了这句话。在北大中文系学习、生活了近九年，杨晦教授是我跟随学习时间最长的老师。1955年进校时 他是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 我听过他的课。1958年大炼钢铁时 我和几位同学去燕东园他的寓所帮他拆毁壁炉取钢条。1960年本科毕业后做他的研究生 他的辅导都在家里，有时在客厅 有时在书房。接触渐渐多了 特别是他辅导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那半年 往往是不预约就贸然而去 多次是他一边用餐一边同我谈。杨老师吃饭简单 他留我在他家吃过几次 每次同他一样，一小碗红烧肉，一碗素菜汤。进校时 他给新生作报告 记得最清楚的是 他激动地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 想当作家 别到这里来。也就是那次讲完话散场后 他在人群中见到了我这个瘦弱的新生 他问我从哪里考来的 在哪个专业。我原是报考中文系新闻专业的 杨老师说 你年纪小 可以重新考虑改学语言文学专业。当时语文专业学制在全国率先改为五年制 新闻专业四

年制。又听说语言文学方面名教授多，后来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名人也多。经他的提醒，不久我就申请改学语文专业了。1964年研究生毕业时他因病休养，由游国恩教授代系主任。我到《文艺报》工作前，游老师约我去他家谈话，叮嘱我出去要好好工作，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游老师是位亲切又严肃的人，在他送别我时，想不到他竟提醒我要去的单位比学校复杂，一切要小心从事。我对他的提醒还不大理解。当我来到《文艺报》上班，主编张光年见我时就说：这是个光荣而危险的岗位。这才使我回想起了游老师的这番用心。离开学校的头天下午，我去看望了杨晦老师，他正靠在二楼书房的沙发上闭目养神，书桌摊满了书，其中一本厚厚的英文大词典张开地躺在那里。那天他精神不好，劝我去了以后多看多听少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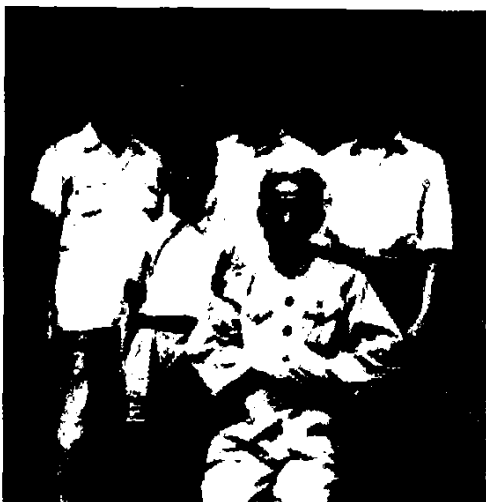
1958年，系里同学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我分在近代文学组。杨晦老师亲自写信给阿英先生，请他给予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帮助。这封信难得地还在：“阿英同志：听说你身体不好，在养病。疗养的效果，好吗？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同学想在最近期间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想请你帮助指导进行。我想你一定很愿意，或者说，一定不会谢绝的吧！并祝健康！弟杨晦 八月四日。”阿英先生时在香山养病，他不仅同我们谈了许久，还

杨晦常忆起 1949年 7月在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与老友相逢的情景。杨晦(右四)右起：胡风、冯雪峰、冯乃超、陈学昭、丁玲、李伯钊、陈企霞、马思聪、吕骥、周立波、田间等。



送了我们他自己编著的有关近代文学书籍 还借给我们难觅的有关图书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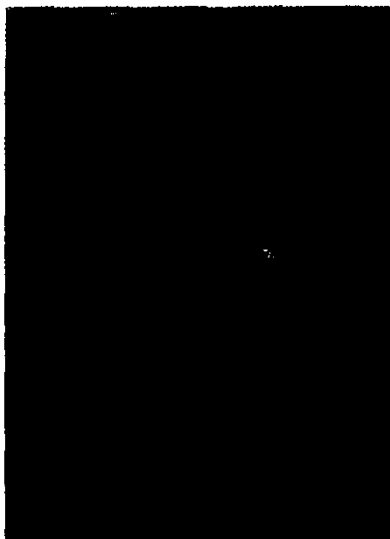
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也是后来陆陆续续听说他是学哲学的，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与朱自清同班。杨老师去世后，偶然与朱光潜



1964年研究生毕业前夕，杨晦（坐）与学生在其寓所北大燕东园37号门前留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老师闲谈时得知，朱自清对杨晦为人文的称赞。1948年，上海文艺界为杨晦庆贺五十寿辰。远在北平的朱自清给杨晦写来了贺信：“慧修学兄大鉴，这是您的一个同班老同学在给您写信，庆祝您的五十寿辰，庆祝您的创作和批评的成绩，庆祝您的进步。我知道‘杨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您远在您成名之后，大概是抗战前的三四年罢，记不清是谁和我说的了。那时我很高兴的是同班里有了您，您这位同道人，可惜的是自从毕业就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是在

我的大发现，发现您是我的同班，或我是您的同班之后，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我喜欢您的创作恬静而深刻，喜欢您的批评明确而精细，早就想向您表示我的欣慰和敬佩，又可惜没有找到一个适宜的机会动笔。今天广田兄告诉我，说是您的五十寿辰，我真高兴，我能以赶上给您写这封祝寿的信！敬祝长寿多福！弟朱自清，



作者与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右）1993年在上海。



1983年杨晦逝世后，上海文艺出版社邀作者主编《杨晦选集》，杨晦老友臧克家(右)冯至为该书写序(图片郑曼提供)

三七年三月十九日北平清华园。”这封信也是朱光潜老师提供给我看的。这封信曾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纪念朱自清先生的特辑中。事后我曾告诉同是作家、学友的杨老师的儿子，他也不知此事，可见杨晦老师日常中的“沉默”。

我常常想念杨老师，特别是他1983年辞世之后。作为一名学生，一直想为他做点什么。上海文艺出版社约请我编《杨晦选集》，我欣然同意了。事后知道，此书的出版得到胡乔木同志的关心。杨老师的老友冯至、臧克家为书写了序文，在杨老师的子女和出版社的支持下，花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编就顺利出版了。出版社给乔木同志送了书。

我非常怀念大学那段生活。庆幸自己有机会能受到那么多受学术界尊重的名教授的教诲。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中秋节，我正出差在上海，一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陪我去江湾复旦大学看望蒋孔阳教授，下午，正好蒋先生

1956年杨晦指导的两位研究生：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左)深圳大学教授胡经之 1998年5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图片胡经之提供)





文艺理论家乔福山（乔山）是杨晦1954年指导的研究生，1998年与女刘乔同回母校参加百周年校庆（图片乔福山提供）



1982年 杨晦最后一次与家人合影。后排左二为长子、作家杨镰（图片杨镰提供）

和夫人濮之珍教授在。蒋先生见到我很意外也很高兴 进门时我叫蒋老师，他连忙摆手。坐定后，他才慢慢地对我说，陪同我来的是他的学生，虽然已是教授了，叫他老师可以，我不能叫。他说：我1956年去北大进修文艺理论，听苏联专家毕达柯夫的课 杨晦也是我的老师。你是杨晦老师的研究生。虽然我比你岁数大得多，我的学生中也有比你大的，但我们还是师兄弟 这个辈份不能乱。蒋先生为人谦和 他夫人又是我们安徽老乡，他俩坚持一定留我在他家过中秋。蒋先生很敬重杨晦老师。他说看了《杨晦选集》很为他解放后写的少惋惜。干了十几年系主任 为教学改革 培养学生付出了大量心血 桃李满天下 但政治运动不断 哪里有什么时间写文章 我和蒋先生有同感。每当我思念起杨晦老师时就想起了蒋先生说的这个遗憾。

## 不倦的爬山人——吴组缃



“文革”后恢复写作时的吴组缃(1977年潘德润摄)

1994年元旦不久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议。孩子电话告我吴组缃爷爷家来电话说吴爷爷快不行了，很想见我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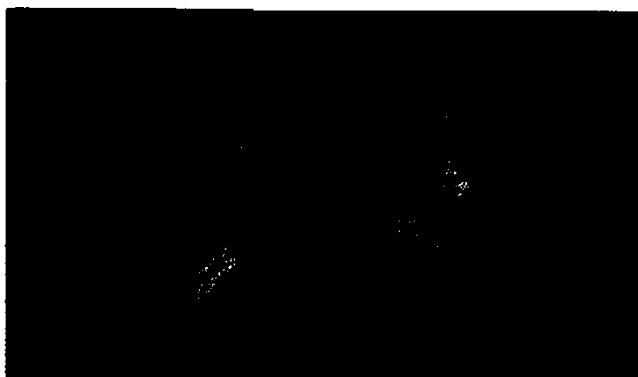
1月8日，组缃老师临终前三天，上午我赶去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匆匆买了束鲜花。我闯进病房，他在安详地躺着。他的女婿叫醒他，大声说泰昌来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缓缓地抓着我的手。一个多小时想说什么又没说出什么。他卧床时间不短，屁股上长了不少褥疮。我和他女婿给他翻身擦洗后，他又昏睡了。

1955年我来北大上学，在授业的老师中我爱听他的课，交往也感到最亲近。他讲授明清小说，开设《红楼梦》讲座，观点之深刻独创，对情节人物剖析之入微，赢得了学生的普遍赞誉。也许是一种家乡情结，很早我就成了他家中的小客人。他使我染上爱喝安徽茶的习惯，师母让我品尝上了诸如臭桂鱼一类的真正徽菜。我特别爱听在课堂上听不到的他那风趣的谈话。他常谈起他对山的特殊记忆。他老家是泾县，他说我小时候就不知道有平原。山的一边是山，山的另一边还是山。那时有个愿望，想爬到山头看看另一边是怎样的，有一次跟姐姐、嫂嫂跑到山上去采果子，跑到山头处，一看，吓！还是山！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平原，我以为



1978年6月23日下午作者在组缃老师(右)家中得悉游国恩教授不幸逝世。

世界就是山。1928年，刚满20岁，他从家乡的山攀登到另一座山——文学之山。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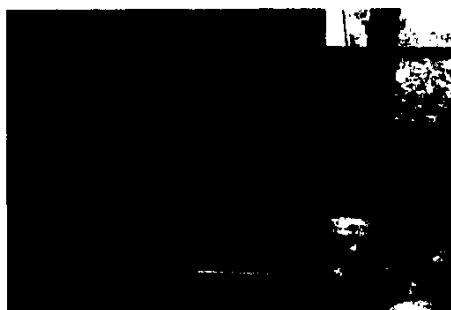
同是乡土文学重要作家 吴组缃与蹇先艾（右）在中国作协一次会上（1985年）

组缃老师自

幼爱读书，少年时就勤于写作，大胆投稿。上大学后，他泉涌般地发表小说、散文，很快引起文坛重视。茅盾及时著文称赞他作品的精致。他的名篇《一千八百担》、《绿竹山房》、《鸭嘴涝》（后改名《山洪》）等早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篇章。

在创作中，长期在大学的讲授中，他对文学有自己执著的主张。他认为，搞创作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作家要有真实感情，第二是作家对客观的现实情况，有实实在在的感受，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作品是需要通过技巧来表现完成的。在艺术的追求上他偏爱质朴、自然的风格。1987年，他为我的散文集《梦的记忆》作序，他在文中说：“我喜欢这样的散文，它们的特色，是随随便便的、毫不作态的称心而道，注重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读来非常真切、明白，又非常自然而有意味。正如一碗淡淡的清汤，上面浮着几粒碧绿的葱花和透明的油味。喝着，满口爽快，觉得很有味道。”

经过十年浩劫磨难之后，20世纪80年代前后，他精神振奋，写作兴致骤浓。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做的事：把几门讲过的课的讲稿整理出来：宋元明清文学史、中国古代小说论要、红楼梦及其他几部长篇小说评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作者时有机会在组缃老师家品尝师母做的家乡“徽菜”。

现代作品选评、鲁迅小说研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想多写些回忆的文章，其中包括散文及小说形式。”他尽力地在做，可惜，80年代后期起，大小疾病不断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吴组缙，约作者来家中谈学会工作（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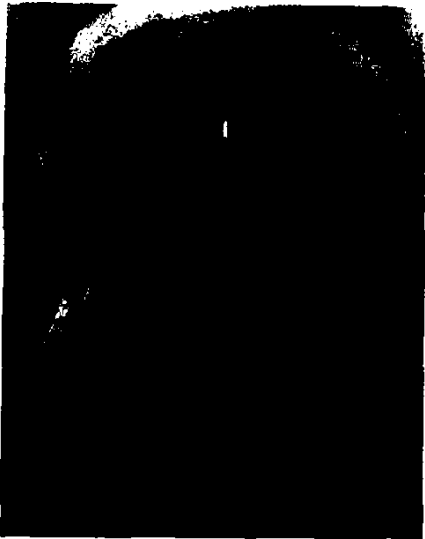
缠扰他不少心愿未能实现。其中有长篇回忆冯玉祥的文章。吴组缙老师1935年后曾任皖籍著名将领冯玉祥的国文老师，与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对冯的思想性格、为人处事态度了解剔透。这篇文章未能写出，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作家兼学者的吴组缙，成就卓著。这是他一生不倦爬山的辛劳结果。他晚年多次对我说，具体的山，再高，只要有毅力最终能攀登到顶峰，而事业之山，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只是个爬山者。

1987年8月，作者（右一）参加辽宁金石滩笔会，雨夜在度假村听吴组缙（左一）谈《红楼梦》宗璞（左三）陈愉庆（后）



## 听朱光潜老师闲谈



朱光潜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  
(1979年 潘德润摄)

朱光潜老师84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读过这位名教授百万言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十分喜爱和朋友、学生谈心。他的这种亲切随和的谈心，汨汨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

和为人文为文的品格。可惜他的这种闲谈 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真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闲谈。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光潜老师说过一句话 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 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 吴组缃和何其芳分别讲授 另一门是“美学” 朱光潜和蔡仪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 年轻好学 这些名教授的课 对我极有吸引力 堂堂不拉。课余休息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老师的美学课安排在大礼堂，从教室楼跑去快也要十分钟。常常是当我气喘吁吁地坐定 讲授已开始了。他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 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 说话缓慢 常瞪着一双大眼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老师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受的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 是主观 客观？.....朱老师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 甚至遭到批评 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 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老师讲

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 知识性强 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60年代初 他仍在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 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已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 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大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几位杨晦教授的文艺理论研究生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三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还在燕东园，怕迟到，我们总是提前去，有时走到未名湖发现才两点，只好放慢脚步观赏一番湖光塔影，消磨时间，一会儿，只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赶去。燕东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似乎是一个个寂静筒 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



朱光潜给学生解答  
美学问题（1982年，  
桑祥森摄）



朱光潜与美学家、北大教授宗白华(中)桥梁专家茅以升(右)在家中(1983年,图片朱光潜家属提供)

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地记。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地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他说得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每次走向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他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是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他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十年浩劫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如翻译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卓越贡献，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意志顽强地完成的。如果说，中国几亿人，在这场十年浩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我来说，一个难说很大但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我研究生期间记录杨晦老师、朱光潜老师辅导谈话的一册厚厚的笔记本被北大专案组作为“罪证”拿走丢失了。好在我的大脑活动正常，我常常在心里亲切地回想起朱老师当年所说的一切。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有，使我和朱老师有了较多的接触。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作为一位老师，他的说话语气再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当年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现在，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着问我：“喝点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我们的谈话就常常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身影不离。他常常开玩笑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 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 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制止他抽烟喝酒。我问他想不想酒 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摇头。1985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我记得我1980年再一次在他家里见到他，并不是在客厅里，朱师母说朱先生刚去校园散步了。我按照他惯走的路线在临湖轩那条竹丛摇曳的小路上追上了他。朱老师几十年来 养成了散步的习惯 清晨和下午，一天两次 风雨无阻，先是散步 后来增加打太极拳。我叫他：“朱老师！”他从遥远的回忆中回转头来，定了定神，突然高兴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我告诉他昨天就想来。他说：“安徽人民出版社要我出一本书 家乡出版社不好推却，但我现在手头上正在翻译《新科学》，一时又写不出什么 只好炒冷饭，答应编一本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短文章选本，这类文章我写过不少 有些收过集子 有些还散见在报刊上。也许这本书 青年人会爱读的。前几天出版社来人谈妥此事，我想请你帮忙 替我编选一下。”我说：“您别分神 这事我



碰杯，朱光潜（左）  
与叶圣陶在家中  
（1982年）

能干 就怕做不好。”他说：“相信你能做好，有些具体想法再和你细谈。走，回家去。”在路上，他仔细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主要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他说起北大好几位教授不注意身体，50一过就写不了东西，开不了课。这很可惜。他说，写作最怕养成一种惰性，有些人开笔展露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这是他几十年的一点体会。五十年前他写谈美十二封信，很顺手，一气呵成，自己也满意。最近写《谈美书简》，问题思考得可能要成熟些，但文章的气势远不如以前了。这二三十年他很少写这种轻松活泼的文章。他开玩笑地说，写轻松活泼的文章，作者自己的心情也要轻松愉快呵，在希腊、罗马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学术空气自由，所以才涌现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文体也锋利，自如活泼。他的这番谈话使我想起来，1978年《文艺报》复刊时，我曾请他对复刊后的《文艺报》提出点希望，他在二三百字的复信中，主要谈了评论、理论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以理服人，平等讨论，不要轻率做结论。他说：“学术繁荣必须要有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